



【原色视域】

嘉宝的睫毛

文 / 韩青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韩青

嘉宝的睫毛,其实,跟嘉宝没关系。它是费利尼对于自己幼年时代跟着母亲看电影时,对女人的最初印象,也是他对自己早年的初恋和情欲历史的基本概括,即:女人是他一生的宗教和保护天使。但是,作为女演员,他认为自己懂得她们,而且能够从容地表现她们;不过,作为一个男人要具体面对的女人,她们的美妙里面都会包含一点莫名其妙的成分,让他弄不大明白,就像银幕上嘉宝那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睫毛,她想说什么呢?小时候的费利尼看默片时代的嘉宝,脸色苍白,以为她是一个女鬼,而那银幕上不断变化的物象,却让他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紧张期待:“兴奋抖动,全神贯注,欲仙欲死的极致感”。后来他进了片场执导筒,体会到那竟然完全跟性的感觉一样,所以,他公开声称拍片像做爱。这样的言行,有点像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事实上,不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生活里,费利尼的终身伴侣都是妻子朱丽叶塔。

作为意大利电影之父的费利尼和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俄罗斯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被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代表着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的最高峰。近年来的“电影馆”丛书出了一批世界顶级电影人的传记性著述,在三位大师口述历史式的回忆或对话著作之中,语气最为轻松的是费利尼,他讲自己的生平影事,差不多就是一个马戏团小丑的故事集,尽管别人把他当成马戏团团长来对待,但是他对自己的看法却是相当明确:“我是一个小丑,电影就是我的马

戏团。”这是他在《我,费利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里对其传记作者再三强调的。

从1980年至1993年,费利尼的传记作者夏洛特·钱德勒花了十四年时间与之对谈,写成这部口述自传。全书分为三篇:上篇是费利尼年幼时如何受到马戏、漫画、电影的影响,年少时如何从家乡里米尼小镇到罗马独自闯天下,从给报馆画插图开始,做记者编辑,进而接触到电台,给罗西里尼做电影编剧写作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等;中篇如同电影人的励志篇,说他如何成为导演,且逐渐有了知名度;下篇则着重在大师与传奇之间,解读一个杰出的电影人对电影的独特理解。这时他已经拍摄了许多被视为20世纪经典作品的电影,如《大路》、《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生活》、《八部半》、《罗马风情画》、《阿玛珂德》,获得各种电影节大奖,还有5次奥斯卡金奖。他对夏洛特·钱德勒说:“我把我仅有一生都说给你听了。这些就是我的遗言,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

被当作遗言来说的话,多半是诚恳之言。这让读者相信,书中多次提及他的小丑理想就是他远大的入生理想:“我小时候曾以为每个人一定都想当小丑,除了我妈外,一定是每个人都想。”这样对小丑的向往,贯穿了费利尼一生的电影,或者说,后来演变成了他的艺术追求。

想起前一阵子,冯小刚跟“屌丝”这个词语及现象态度激烈地较劲,中国的文化人对小丑的形象,似乎颇多憎恶,至少是没有什么喜感。喜欢小丑,仿佛是欧洲的一种文化传统,西方绘画中的小丑,是郑重其事

的肖像画,而马奈、塞尚、毕加索画过的那些穿小丑服装的人,则让人觉得小丑或者被小丑,近乎抒情。费利尼当年进入电影界扬名立万的成名作,就是女主角为小丑形象的影片《大路》,这也是他最赚人眼泪的一部电影,费利尼太太朱丽叶塔扮装的小丑,生得难看还有智障,在世界影坛历史上,这是与卓别林扮过的小丑平分秋色的伟大小丑。在这部1954年上映的影片中,流浪艺人藏巴诺买下了弱智姑娘杰尔索米娜,藏巴诺遗弃了她,杰尔索米娜遇到了一个绰号疯子的钢丝艺人,随后三人命运交织,最后藏巴诺杀死疯子,杰尔索米娜不久也死了,孑然一身的藏巴诺在黑夜夜里来到海边,想起了她……1945年费利尼编剧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被当做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而《大路》的问世,则被看成意大利电影运动的新转换——从社会现实转向了内心现实。这个转变使费利尼电影引导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精神进程。

费利尼1963年拍摄的《八部半》,讲了一位拍过八部影片的导演,如何在筹拍第九部电影时灵感枯竭和精神崩溃的故事,在许多闹哄哄的场景里,都伴随着马戏团叮叮咚咚的音乐:梦是唯一的现实。片中的许多场景堪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媲美,怎么去表现回忆、幻想、性和梦,它们已经是电影学院的教学范本了。费利尼是从哪里学到这一切的?他说自己出门总是乘出租车,罗马城许多出租车司机都认识他,对此,他也像对嘉宝的睫毛一样惊奇:“我没有教他们开车,他们却教我拍电影。”

文 / 蒯时工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自然的、心理的)而引发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在泰山主体文化的积淀中发展而来。当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就奠定了泰山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史传“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自秦至清,作为一代帝王大都想在泰山“受命”;自孔夫子起,历代无数或可代表社会精英层的士大夫,也渴望在泰山找到精神的皈依;而几千年来,庶民百姓年复一年的进香活动,无时不在圆着国泰民安的生活梦,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泰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时如此评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没有人怀疑: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泰山信仰以神人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对神灵的崇拜,它扩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中,从而构筑了一个丰盈、多彩的精神空间,无论是一个人作为信仰主体,还是一个群体作为信仰主体,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自我超越。继而,泰山信仰又通过封禅祭祀、神祇司职、宗教形式、民间习俗等,作用于中国社会,从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核心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泰山信仰及泰山信仰的主旨与核心,历来的研究者及其著述,或失之简略,或语焉不详,或模棱两可不得要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切的概念。而《泰山信仰与中国社会》一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即在于第一次对泰山信仰及其主旨进行了明确阐述。

书中指出,泰山信仰的核心是“生生不息”,无论是泰山东方象征意义的确立,还是泰山神祇的形成、泰山封禅的发生等,概括起来,所围绕的中心无不在一个“生”字。泰山信仰,也可理解为生命信仰,这种信仰源于对太阳的崇拜。太阳是世间万物的初始者,而由太阳运动所引发的阴阳观念是对生命的慨视。天、地作为与阴阳对应的范畴,是生命的缔造者,封禅所完成的即是对天地之恩德的答谢。大德曰生,在泰山信仰的历史发展中,对“生”与“生命”的崇尚,始终是一个永恒的基点,而泰山信仰的宗教与非宗教特性,使其具有了广泛的“适应度”,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都会感觉到它强大的活力。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社会制度的变更,泰山信仰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泰山信仰在某些方面正在逐步摆脱其宗教色彩的束缚。无论是“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还是“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以及“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等,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基本追求。书中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构建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大有裨益,同时也大大升华了泰山信仰的重大现实意义。

文 / 王淼

这些年读过不少有关美食方面的文字,而韩韬的《食札思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对鲁菜和山东的小吃多有谈及。

作为山东人,山东本地的菜系和小吃最让我感同身受,自然不必多说——像什么包子油条、烧饼茶蛋、甜沫儿羊汤、油炸“结了龟儿”等等,韩韬喜欢吃,我又何尝不喜欢吃呢?然而,同样让我感同身受的,还有韩韬笔下的那些令我感到既熟悉又亲切的场景:小路斜街、小院平房、昏暗的老店铺、街边的小吃摊……韩韬在谈及济南小吃“油旋儿”时,这样记录下杆石桥下的一个小吃摊:“曾经的杆石桥下,有过一对老夫妻,守着个边边大的摊子,媳妇和面,丈夫烙饼,两人都没有太多话语,笑着收钱,笑着打油旋儿。可他们家那一阵阵的香气呦,仿佛是有个灵魂,随着桥下静静的河水绕来绕去,绕进过路人心里。我那时还小,有福气,总去吃。”如此情景,恍如梦里。事关一般山东人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当然也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所谓“饮食男女”,饮食在男女之先,可见吃饭乃是人生头等大事。但“饮食”上升为“美食”,却带有了点形而上的味道,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吃饭问题了。在韩韬的语境中,“美食”二字,是与“用心”分不开的。所以,韩韬谈扬州炒饭,却以为要论最合口味,总还是自家的炒饭,“因为有妈妈味,既可以吃得胃里饱饱,又可以吃得心底暖暖”。美食同时又与乡愁相关,韩韬自小在济南长大,成人后走南闯北,在遍尝各地风味之余,往往觉得有些饮食固然常见,但是,只有在济南吃来,味道似乎更胜一筹。如此感觉,虽然不免有敝帚自珍之嫌,但流露出的却是一种人之常情。

事实上,小吃之类的传统“美食”,多是与富有地方特色的小路斜街、小院平房分不开的,正是在那些曲径通幽的小街、小巷、小胡同里,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惊喜。从韩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举凡让他大快朵颐的饕餮所在,总是那些隐藏在都市一隅的市井人家,也总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风味小吃——比如默默蜷在人行天桥下的丹东名吃“马家焖子”;比如开在一条狭窄旧巷中的长沙名吃“李公庙糖油耙粑”……韩韬既喜欢在这样的所在,守着三钱的小盅,温一壶小二,一个人坐在墙角大啖爆肚;也喜欢在有院的小店中,矮凳几把,三五知己围坐,畅快痛饮,快意江湖。但遗憾的是,现如今城市改造,老店式微,这样的所在早已难觅其踪。等而下之的,则是吃客们来去匆匆,懂味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大家不爱美食,而是他们缺少从容不迫的心境。韩韬说:“洋玩意儿比土玩意儿有市场,愈是守不住传统的地方,愈是这样。”

平心而论,在我读过的美食文字中,韩韬的《食札思录》并不是最好看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文采平平。不过,韩韬人实在,写得也实在,下笔自然有声有色,有着一一种信手拈来、直抒胸臆的真诚——他写出了美食之味,又写出了吃客之心,虽然未必“识得食”,却如实写出了自己的心境与心情,应该不乏一番得鱼忘筌之乐吧。

文 / 张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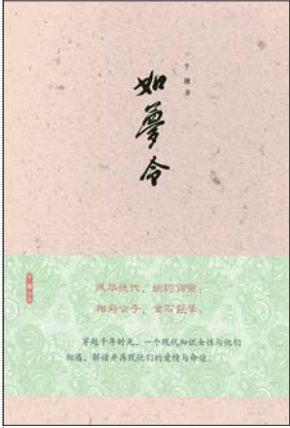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如梦令》,是军旅作家于雁继《清水无痕》小说集出版后,文学梦想的又一次激情释放。《如梦令》读来如清风拂面,耳目为之一新,令人惊讶于作者的曼妙才华、独特构思和丰富的文史知识。《如梦令》作为一部描写中国最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纯文学著作,大大超出了同时代诸多关于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小说语言流畅婉转,气韵生动,字里行间闪现着一颗清新灵动的诗意心灵,处处流淌着浓郁的诗文词韵,体现出一种历史文化重写与当代文化建构的自觉。

《如梦令》结构新颖巧妙。除尾声外,整部作品分18节,作者分别赋予李清照和赵明诚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角色。第一节的“我”是李清照,第二节的“我”是赵明诚,第三节“我”又回到李清照,构成了一种互相穿插、彼此说明、“我”与“我”相互映现的“双峰并立”的叙述结构方式。这种叙述结构,恰好是与《如梦令》小说主人公的性质、关系、身份相吻合的。李清照和赵明诚都是著名历史文化人物,其文化身份、历史影响力都足以构成并立对峙的“双峰”;而李清照和赵明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欣赏、互为知音的夫妻关系,在交互的“我”与“我”的叙述中,彼此缠绕交织,而又心心相印。这不仅带来叙述的铺垫、勾连,情节的绵延和自然发展,人物心理的深度书写,更为重要的是,“双峰”叙述结构呈现出了李清照和赵明诚之间逾越中国古代社会夫妻伦理关系的经典爱情,即彼此具有主体性、相互深深挚爱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爱情。因此,“双峰”结构的叙述方式,不仅是小说的一种结构,更是小说人物独立灵魂、生命本质与爱情关系的最好表现方式,体现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所言的“形式本身即是内容、思想和灵魂”。从这个意义而言,于雁探索到了本小说人物塑造的最佳形式,即“李清照和赵明诚之所以为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小说结构模式和言说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于雁的《如梦令》以开头的李清照从济南来到京城与美少年赵明诚相遇,到尾声的李清照与赵明诚生离死别,中间大部分章节都呈现了李清照和赵明诚两人耿直磊落的人格品性和与天地相通的诗意心灵,以及诗文唱和、金石编录的审美化日常生活,赵明诚的官宦生活倒成了女词人审美人生的点缀和倒影。毫无疑问,这种审美化人生方式和生活态度,恰好是当代中国人所遗失和匮乏的,是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重要精神维度之一。这也是于雁《如梦令》之于当代文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古典审美化人生的现代诗意图

《如梦令》
于雁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2年出版



美食之味与食客之心

《食札思录》
韩韬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生命的精神家园

《泰山信仰与中国社会》
刘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